

· 会议综述 ·

作为方法的鲁迅及学院派研究的未来

——鲁迅研究青年论坛会议综述

刘春勇

(中国传媒大学 文法学院, 北京 100024)

为纪念鲁迅逝世80周年、诞辰135周年,以“70后”为主体的鲁迅研究群体于2016年4月16日在北京举办鲁迅研究青年论坛。来自北京及周边高校和研究机构约30多位青年鲁迅研究者参加了本次会议,钱理群、高远东、李静等学者作家作为特邀嘉宾也出席会议并发言。论坛围绕“‘作为方法的鲁迅及学院派研究的未来’”这一中心议题,以“30后与70后”和“民间与学院”两个“对话”,概括鲁迅研究学术承传的时空纵横两个向度,集中探讨了当前青年鲁迅研究的现状及困境、话剧《大先生》的鲁迅形象塑造、鲁迅研究新著《文章在兹——非文学的文学家鲁迅及其转变》的得与失等重要问题。钱理群先生作了“对青年鲁迅研究者的寄语”的长篇发言。此次论坛是沙龙形式的研讨会,气氛热烈,问题探讨由相互启发引向深入。本文以与会者发言摘要分类合并入三个议题方式,将互动对话现场氛围及研讨进程一并呈现给读者。

一、青年鲁迅研究的现状与困境

青年鲁迅研究的现状及困境是鲁迅研究界以及整个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也是本次会议探讨的重要议题。

鲁迅研究既有一般学术研究的共性,又具有不同于纯粹学术研究的特殊性,即对研究者个体的人格要求与学术品质塑造。因此,新生代鲁迅研究高峰的出现,是对鲁迅这一研究对象的理解阐释抵达深度的标识,更取决于研究者个体生命意志的高度融入,以及面对当下问题,感悟鲁迅,反思历史,直面现实,承担未来的胆识与勇气。

贾振勇(山东大学)在发言中提出,研究鲁迅面临着三个层面的困境:首先是在精神溃败的时代,理解和阐释鲁迅的步伐已经基本停滞,目前许多研究者虽然掌握了大量的鲁迅研究资料,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研究缺乏温度和生命力,很难像30后鲁迅研究学者那样将个体的生命意志与鲁迅研究融为一体;其次,我们的知识谱系、价值秩序和意义系统存在很大的问题,前辈学人所创造的理解鲁迅的话语体系带来很大影响和启示的同时,这种知识结构和话语体系对我们的研究和思考也可能造成很大的束缚,“70后”至今尚未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最后,作为鲁迅研究者,不仅要感知鲁迅,更要感知鲁迅的时代,但当下我们的历史观、价值观乃至生命观存在很大的问题,导致我们很难真正回到原点、回到历史。

刘春勇(中国传媒大学)认为,研究者首先应有一个问题意识,即理解我们今天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们其实已经抵达了一个大的历史转折期,所谓“现代”时期——“modern”——其实已经到了终结的时候,所以如何以终结“现代”这样的问题意识去研究鲁迅,这是关键。首先,我们需要重拾前一代人的这种问题意识,将自己的生命写进各自的鲁迅研究当中;其次,要将鲁迅作为方

[作者简介]刘春勇,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法,而不仅仅是就鲁迅研究鲁迅。以战后的日本鲁迅研究为参照,大陆青年鲁迅研究学者要有一种“溢出”的研究意识,将鲁迅作为切入点和方法,从而思考个人的自立、家国的现代性道路以及反思世界范畴当中的现代诸问题;思考问题的视野不能太局限,要树立一种长历史观,从欧亚大陆内部的推动力来混元一体地考量欧洲现代的发生及其世界范畴的影响,并从内亚学的角度重新打量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这样一种线性结构和思维模式。过去我们的研究当中太过于重视 modern 这一时段,研究视角几乎被 modern 这样一种思维模式所淹没,现在急需引进长历史观,引进内亚研究的范式,在一种超长的历史视野中重新审视 modern,将现代以来的线性思维模式放置在更大的一个循环历史观当中重新进行审视,只有这样,我们再来重新解读鲁迅,或许才会有更深刻而有意味的发现。

崔云伟(山东艺术学院)认为,当前鲁迅研究中没有出现高峰式的成果与研究者的态度有很大关系,一般的研究者缺乏超越性,容易满足于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的不断重复性的位移,不去接触和解决真正的大问题。就此,提出三点建设性的意见:第一,我们必须尽快找到鲁迅研究和当下现实的有效连接点,这样才能够继续保持鲁迅研究的生命力;第二,我们必须突破既有的思维模式,突破当前鲁迅研究中的思维障碍,努力实现新的范式革命;第三,我们要时时自我反省,甚至自我质疑,明确我们和鲁迅之间的精神距离,继而奋起直追。

陈洁(北京鲁迅博物馆)根据自己写作博士论文的过程,谈了青年学者研究创新的体会。认为鲁迅研究作为一门显学,研究体系相对成熟,给青年学者实现进一步而富有新见的开创性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开拓难度和学术突破的挑战性,同时又促使我们努力寻找鲁迅研究中的空白地带和前辈学者成果中存在的盲点。例如,鲁迅研究中时间这条线已经非常清楚,但从空间这个角度进入鲁迅研究,我们可以做得更深入化、具体化并且具有突破性。自己的博士论文就从空间这一研究视角切入,对鲁迅在北京时期的交游进行系统研究,选题本身和论述都对鲁迅研究有所突破。论文还原了鲁迅在教育部的工作经历这一鲁迅生平史上的空白和模糊地带。提出了新的观点,对于鲁迅在绍兴会馆时期钞古碑及其在教育部的的工作,给予积极正面的论述,打开了相关问题研究的新思路。发掘为过去一般研究所忽略的所谓鲁迅“沉默的十年”的意义。

费冬梅(北京师范大学)从朱自清回忆鲁迅的文章里一个关于鲁迅的小细节,提出鲁迅有“创伤心态”。1926年鲁迅从北京去厦门路过上海时,几个文学研究会成员饭后去他入住的旅馆聊天,大家一起进门,鲁迅脱下长衫,顺手放在床上,夏丏尊提醒他,长衫应该挂在衣架上,鲁迅没理会,谈话继续;其间夏丏尊又第二次提醒:“豫才,长衫要挂起来”。鲁迅说:“长衫是不必挂起来的。”这个细节就可以用“创伤心态”来解释,是鲁迅作为乡土知识分子进入城市之际面对生活他的一种不适的体现,又是他倔强、固执、自尊的创伤心态的一种体现。这种创伤心态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鲁迅杂文中的某些论断,虽然“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是鲁迅的独特文风,但对某些“强词夺理”之处,我们应该持警惕态度。

曹振华(山东社科院)回应费冬梅。就这个具体细节来看,未必一定就是鲁迅的创伤心态。我是为感受70后学术沙龙的现场气氛参加会议,事先没有准备发言。现在觉得就这个细节讨论,也可以映现有意思的问题,就在此表达一点自己的理解:关于鲁迅作品解读,争议不断,体现了文学经典有无限的阐释空间;但是,对鲁迅为人,褒贬也天差地远,却一直不为学术研究界重视,其实,这也是鲁迅研究一个不应忽视的问题。研究鲁迅行为方式与其思维方式的关系,以及人们对鲁迅行为思想的不同理解,也是全面系统完整地理解鲁迅不可或缺的。

就挂不挂长衫这事,我首先想到的与70后80后就不一样,我是60后。从这日常简单的事情看出,鲁迅非常认真,再是他不喜欢生活上时时处处被“规则”。鲁迅脱下长衫来顺手放到床上,在作为绅士的夏丏尊看来,这像个粗人或者下等人的做法。鲁迅与夏是同事、好朋友,夏提醒他的时候,他明白夏的意思,就不理会。一般情况,提醒人家不理,这个事就算完了。可夏一会儿又郑重其

事提醒一遍,这次鲁迅也郑重其事反应:长衫不是必须挂起来。潜在的意思可能是:“咱就做这一回下等人,有什么不可以?”就长衫挂不挂起来这件事,朱自清的回忆,夏丏尊的略带“管教”式提醒,鲁迅对这点细小事儿的坚持,都很有趣。

鲁迅也属于绅士阶级,但他自称有下等人脾气,这种反应更可能来自他对上等人规矩不以为然。生活细节既反映了鲁迅性格的特异性和丰富性,也带有鲁迅思想的特征,不同解释也形成各派的研究路径及其差异性。

刘春雨则认为,也不能小视鲁迅少年成长期的“创伤”经历,他认为,鲁迅终其一生执著地站在弱者的一边,可能跟他早年的这样一种致命的“创伤”经历大有关系,甚至鲁迅 1930 年代左转的秘密也多少要归因于此。

赵寻(中国国家画院)谈了三个问题,首先,就当前学界中盛行的代际问题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提出,五四就不是代际分别的结果,相反是代际合作的结果。目前不是要强化代际,而是要克服代际。他认为,当我们看一个伟大作家或伟大艺术品的时候,大概需要三种视野: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长时段的视野里面,要谈“文明”的概念,中时段的概念里,经济的和政治的结构这部分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时代精神”,短时段的概念里面非常重要是“心态”。历史研究需要这三个时段的结合,但是由于我们生命有限,所以,其实真正需要的,是中-短时段的概念。其次,关于“学院派鲁迅研究”的问题,我们目前陷入到了对“日本式鲁迅研究”的迷恋和模仿当中,然而,文革结束后兴起的日本“东亚研究”,已经完完全全丧失了一种东亚文明的整体意识。在这样的情况下,其所谓的鲁迅研究,无非是一种繁琐论争与论证而已。而这样的鲁迅研究,几乎可以说是切断了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和与之相关的中国历史问题的联系。对鲁迅及五四文化,从五百年的视野来看,王阳明离世后的东亚精神世界,处在一个长期的空虚当中,在王阳明之后完全没有产生一个可以像他和他的学派一样,支撑整个东亚的精神结构的人物和这样的思想。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来看五四的时候,五四只不过是晚明以来反宋明理学运动的继续和高潮,而这样对宋明理学的反对,不过是在三百年间清统治中在对宋明理学的强迫性的遗忘中造成的,它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后果:不仅通过新文化运动和鲁迅我们无法重建这一中国文明的基本联系和感觉,我们甚至通过鲁迅的师长辈如章太炎先生,也无法恢复我们的文明身份和文明感觉。这才是现代中国真正的危机所在。

二、关于话剧《大先生》中鲁迅形象塑造问题

李静创作的先锋话剧《大先生》在国家大剧院上演以来,获得文艺界、媒体和观众的热评,但是却很少听见鲁迅研究界的声音,以《大先生》为中心展开的学院派鲁迅与民间鲁迅的对话是本次会议的亮点之一。

高远东(北京大学)是本场主持人,他认为,《大先生》是一个思想剧和先锋剧,以“鲁迅与中国现代历史的关系”以及“中国现代革命的关系”为中心,对我们中国的思想、文化和历史未来之走向有很深邃的思考。在某种意义上说,《大先生》剧本的意义超过了演出,剧本中真正体现了鲁迅的矛盾与挣扎。李静笔下的鲁迅,不仅是一个文学家的鲁迅,也主要是一个思想者的鲁迅,一个革命者的鲁迅,他跟中国的历史,当下的现实有很深刻的连接。同时,不能简单化理解“民间鲁迅”,李静其实对 1990 年代以来的鲁迅研究论著极其熟悉,她把这些都融进了自己的思考当中,所以不能简单地把《大先生》归为“民间鲁迅”。《大先生》是一部艺术创作,它不同于学术研究,但也不是民间的。

钱理群(北京大学)认为,《大先生》是一部思想者的剧作,而这正是我们现在的文学研究所需要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理解、发挥的鲁迅,在理解过程中,有误读、有发挥这都无可避免,但是作

家具有自由创造、自由发挥的一面,而学者的发挥是有限度的,会受到本体的制约,不可以随意发挥,学者跟作家的区别就在于学者有更加严格的叙述标准与要求,从学术的角度看,李静的《大先生》一个弱点,就是对鲁迅与革命之关系的阐释比较简单,对鲁迅的超越性部分表现不足。剧作的主要价值和成功之处,是抓住鲁迅思想的核心来面对中国当代问题的核心,一方面表达鲁迅对中国革命的思考,一方面表达鲁迅对革命胜利以后的中国社会的思考与隐忧。强烈的当代感震撼观众。

荣挺进(中国鲁迅基金会)指出,李静将自己的思想与鲁迅的情感很好地融合在一起,鲁迅是一个高度,是一种立场,但是必须要将自己的情感体验和存在体验融入进去,才可能产生出鲁迅的时代意义。

顾广梅(山东师范大学)认为,划分“民间鲁迅”与“学院鲁迅”,容易将鲁迅研究二元简单化。《大先生》的创作,应该放在中国当代文学整个谱系之中分析。这是对鲁迅文学创作的一次了不起的模仿,也是一次了不起的超越。回到鲁迅这个问题来说,鲁迅文学写作开启过许多第一次,而且被模仿性的可能性比较差,这是对鲁迅原创性的一个定位,这恰恰说明鲁迅是一个很神秘的存在。当代文学众多作家他们在模仿鲁迅的灵魂和精神,深化和延展属于中国化的隐喻、寓言的写作方式。李静女士《大先生》写作,应该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在九十年代人文主义话语语境下张承志的“以笔为旗”,余华的《一九八六》,以及新生代作家东西的小说《请勿谈论庄天海》,都有着对鲁迅精神的复活。李静的《大先生》对鲁迅的精神世界有着高度的和饱满的隐喻。作品中触动人心弦的几个地方,一个是鲁迅对闰土充盈的情感,一个是那把椅子的意象,还有一个是人物的语言。作为一种意识流剧,《大先生》的语言富有哲理性,颇像莎士比亚的独白剧,其次,剧作语言能够把我们当下的语言非常巧妙地带入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并且不断发生碰撞。张承志、余华、东西这三位作家和李静是相通的,因为鲁迅是集权的最大的敌人。

刘春勇(中国传媒大学)认为,这部话剧的形式令人震撼,能够以非常丰富的形式、意象表达出创作者的思想,并且具有昆德拉式的思考,对极权进行了深刻地反思,对一般性讲故事的文学创作是一种很大的超越。但对于鲁迅20世纪30年代的左转的处理有些简单,是本剧的瑕疵。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的左转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30年代的左翼是一个巨大的国际性问题,鲁迅可能是当时中国少数的能跟世界同步的作家,他跟左翼的纠葛与法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超现实主义非常相似,而这些问题又都跟托洛茨基相关联。厘清鲁迅与1930年代国际左翼的关系是一个非常的难题,这个问题需要中国整体的、不仅仅是鲁迅研究者,还有无论是左翼、右翼、中翼知识分子,都需要思考的复杂问题。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就会直接影响话剧《大先生》中的鲁迅形象塑造,尽管李静在这方面做出了一定的探索,但无论如何还存在一些问题。

赵寻(中国国家画院)提出,话剧在鲁迅的梦境这一幕中,有很多人与鲁迅谈话和告别,而这个梦境实际上是我们的现实,是二十世纪的历史,是我们二十世纪的阶级史,告别的人应该是来自于自由主义阵营、传统主义阵营、社会主义阵营以及与鲁迅有情感联系的人,对告别者的名单有不同见解。

第二场次的最后,李静对各位学者的评述做了简短的回应。

三、鲁迅研究新著《文章在兹》的得与失

刘春勇的新著《文章在兹——非文学的文学家鲁迅及其转变》(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是“70后”鲁迅研究中一部重要而富有特色的研究著作,在某个侧面上,从方法论的角度为“70后”鲁迅研究突破前辈学人的话语束缚与思想局限做出可贵探索与尝试。论坛的第三场集中讨论了这部著作的得与失。

钱理群(北京大学)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讲,《文章在兹》的写作还是很可取的,以抓住鲁迅

的一些关键词为脉络,用鲁迅的话语来解释鲁迅自己,而不是用别人的话语去破坏他。并且认为该著作中重点论述的“留白”是研究鲁迅的一个重要概念和关键词。此外,他还对刘春勇提出的打破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这样一种线性史观,建立一种长历史的循环史观表示赞同。

李林荣(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认为,刘春勇从文章学这个角度去面对鲁迅,这有别于以往那种把鲁迅仅仅当成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家或者思想家的方法。而且《文章在兹》将“文章学”这个老的名词在新的思路新视野上做了很深广的开拓。

鲁迅的写作实践是跟他的人生实践、社会实践和翻译实践相伴随着进行,也相伴随着产生意义。而70后一代人接受的有关鲁迅的教育,最基本的一条,是一种先验式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三位一体的形象观和价值论。随着从上大学、念研究生、再往后到相对独立地从事教学和研究的整个学术生涯的展开,我们逐渐地把思想家和革命家这两层含义从鲁迅这个名字和《鲁迅全集》这个文本的集合当中抽离掉了,剩下的就是文学家。作为被抽离出来的文学家的鲁迅和历史现场当中真实存在的写作者、实践者鲁迅,也就是主要用文本、主要用话语的方式履行他的社会职责的鲁迅,这几者之间,需要从知识学的角度进行一个模拟性质的还原。从这个意义上讲,刘春勇的《文章在兹》,牵涉的不光是一个课题范围里的“在兹”,而且恐怕是鲁迅和整个鲁迅同时代人同样面临的大问题。他们是以正在进行的状态,致力于重构中国的文人写作、也重构中国关于文学这个知识体系当中的文学观念、文学的及物性,或者说文学的社会属性,还有文学写作自身的内在机理,甚至文学这个家族中各种既存和可能可行的写作样式。

更进一层看,鲁迅在这些方面的实践和开创,和他的同时代人相比,又有很多独特的个性化的表现。这跟我们接受的教育结论和我们习惯了教给学生的鲁迅和鲁迅时代的知识,存在显著的偏差和歧异。鲁迅时代的文学观念情境和鲁迅一代人的文学实践所重构起来的那个文学形态,已经远离我们。那个形态在鲁迅的时代是一个新的形态,也是一个未完成的形态。我相信春勇的文章学的研究和解读鲁迅的努力都还没有结束。

我有一个和春勇认识不太一样的地方,或者说这也是他著作涉猎得比较少、没有做正面具体交代的一个问题。这就是,我觉得鲁迅本人虽然投身文学创作的时间并不长,一方面他在跟历史遗留下来的文学传统和文章写作传统不断地挣扎和搏斗,另一方面他也跟他自己的选择和试验时时刻刻地在做斗争。鲁迅的文学或非文学、学术或非学术的话语和文本当中,文章这两个字组成的这个词、文学这两个字组成的词,还有相关的其他各种各样归在这两个概念和范畴内外远近的词义,是不断在变化的。春勇书里的“文章”和“文章学”,虽然他本书立意不是要做完整的和系统的鲁迅所有创作细读,但从研究视野上,好像对鲁迅的写作有一网打尽之势。事实上,鲁迅对自己的写作实践和有关“文章”的认知把握,一直在变动之中,而且这个变动是有很明显的时间节点可寻的。我这里就提这么一点:鲁迅1927年在广州知用中学关于读书的演讲,即《读书杂谈》中,所用的“文章”一词,实际上跟我们现在说的文学创作的含义非常接近,但是后来这个含义鲁迅自己也舍弃不用了。当时鲁迅是把“文学”和“文章”对举的,他说的“文学”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文学研究,而文章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纯文学写作。这一年也恰是鲁迅思想转折的一个关键点。

今天的鲁迅研究确实面临困境或者是面临一个重新寻找出路的问题,导致这个困境、妨碍新出路形成的一个症结,就是现在鲁迅研究不断地被碎片化、被零星分割,形而上的思想性研究也好,文本和实证的个案解读也好,民间和大众的演义和生发也好,学院派的理论建构也好,都在不断地割裂鲁迅,割裂得越来越厉害。每一次碎片化的鲁迅阐释和鲁迅解读,都意味着对鲁迅这个名字所代表的文学生涯和社会生涯本身的严重遮蔽。

顺便也提一点,我不赞成把70后鲁迅研究者群体化的说法。从不仅限于鲁迅研究的当今整个人文学术生态的全局来看,不赞成在鲁迅研究者的行列里特别举起一个70后群体的旗号或标牌。因为70后现在无论从生理和学术的尺度上上下下左右衡量一下,都不能算新人了。现在我们老也不

老、少也不少,年龄都相当于鲁迅在思想上发生最急剧、最深刻变化的1920年代末的那个岁数了,正介于“历史的中间物”阶段。在这个阶段最需要的是钱老师多年前提倡过的各别的沉潜和在这种沉潜中再出发,不是青春期式的张扬和群体自我标举。

宋声泉(北京邮电大学)认为,这部著作在精彩之余还存在几个层面的问题,主要为:首先鲁迅从“文学”到“文章”这样的变化应先有一个必要性,对鲁迅“文章”和“文学”这两个词的使用情况做一个梳理和统计,进而探讨鲁迅自己是如何看待“文章”和“文学”这两个词语;其次,“文章”在一个传统文本中,也就是“文”的概念是特别重要的,而这部著作中从传统文论的层面切近鲁迅文章学的研究并不是很多;最后,章太炎的文章观对于鲁迅的影响特别大,而《文章在兹》中却很少涉及。针对这部著作中“文章没落了文学兴起了”这个观点,认为“文章”不是没落,而是小说文章化了,20世纪小说向中心移动很重要的一个动力是小说的文章化,所以是不是真的文章没落还存在很大的讨论空间。

孟庆澍(首都师范大学)认为,《文章在兹》对前辈学者的研究有一定继承性,并且体现了作者寻找自我的紧张、焦虑和执着。这比较突出地体现在作者试图寻找一些核心概念,建立核心命题,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鲁迅的理解。但这部著作是在竹内好、伊藤虎丸、木山英雄等提出的概念基础上进行的对话,是对抽绎出来的理念进行的再抽绎,是在鲁迅学内部生长起来的,这则导致了一个问题,即它虽然借用了大量的哲学和思想史理论,但其结论不具有回过头去影响哲学或思想史研究的能力。应该回到“实践”和“行动”的语境里重新思考鲁迅、理解鲁迅,强调他的行动和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只有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社会实践中,鲁迅研究才能不断被新的矛盾所刺激,发现新的问题,才能保持活力。

陈洁(北京鲁迅博物馆)认为,《文章在兹》是从鲁迅自身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鲁迅的写作是对当时体制的一个反抗,鲁迅讲他的杂文不是“文学概论”中定义的文学。而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现在也有人提出鲁迅的杂文是一种文学性的杂文,就此有一个问题,是否只有鲁迅的杂文能被称为文学,而其他很多作家的杂文很难被列为文学的范畴。

费冬梅(北京师范大学)就陈洁的疑问进一步提出鲁迅杂文的文学性问题,认为鲁迅杂文的文学性可能正是鲁迅杂文存在的一个问题,鲁迅称他的思想是有毒的,那么这个毒性,如果说有毒的话,则正体现在杂文方面。

顾广梅(山东师范大学)认为,《文章在兹》很好地体现了作者的学术想象力及理论功底,该著作依据的昆德拉小说理论所提出来的“类圣经书写”给人以很大的启发,但对昆德拉的小说理论有必要做一个考察。因为昆德拉的话语是有限制的,他所有的小说史观,都是以欧洲小说为中心的,甚至把拉美小说也认为是欧洲小说体系中的一个延伸。就此提出疑问,若以昆德拉的理论来研究鲁迅,小说史观中的欧洲文化中心问题要如何处理?并且,昆德拉的小说理论将欧洲的小说分为第一时、第二时和第三时,昆德拉本人对第一时即塞万提斯那个时代的小说极其迷恋,并且认为第三时即欧战之后的小说是对第一时的小说美学的回归和超越,而鲁迅的小说可以说跟第三时具有同步性。

张永辉(中华女子学院)根据鲁迅作品中“虚妄”与“切实”这两个词语出现的频率,提出寻找鲁迅的关键词应寻找低频词还是高频词以及如何寻找关键词才能更好地贴合鲁迅精神这个问题。

孙良好(温州大学)提出鲁迅研究虽然非常深入,但是否真正深入民间,激发日常人对鲁迅的兴趣是一个值得研究者思虑的问题。《文章在兹》把鲁迅写作的各种可能性、把鲁迅思想的斗争性要发挥到一个比较高的状态中去,但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始终都是在知识分子的圈子内回旋,无法让一般人走进鲁迅世界。或者简单说,如何让形上的理论回到形下的实践?

对于诸位同仁的问题,刘春勇做了简短的回应。关于孟庆澍所讲的“实践”问题,刘春勇认为对鲁迅“实践”与行动这个问题应该做具体区分,鲁迅的实践与行动不是一个简单的革命实践的问

题,而是一个思想领域内的革命与实践,这同木山英雄先生对长堀佑造的《鲁迅与托洛茨基》的批评文字里所提到的,鲁迅的革命实践同具体革命行动是有一个本质性区别这一点是相关联的。对于顾广梅所提出的如何处理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理论问题,刘春勇认为昆德拉的小说批判理论其实是专门针对欧洲小说第二时(以巴尔扎克为代表的),他所谓的第一时其实是一个现代与古典混杂的小说实践,而第三时则又有对第一时的回归的倾向。而《文章在兹》中所使用的是昆德拉小说第二时的概念。并且刘认为所谓的第一时、第二时、第三时我们会以一种线性史观来关照,但现在换一视角,用一种循环史观来看待这个问题,或许会有新的东西出来。对于陈洁提出的杂文文学性的问题,刘春勇指出鲁迅的杂文是出于他“有余裕”的文学观念,“有余裕”也就是留白,它不仅是文章的写作问题,也是鲁迅的一个伦理实践、美学实践、生活观念以及他和世界理解度问题,即虚妄的问题。对于费冬梅关于鲁迅生命中的毒气和鬼气同鲁迅杂文创作的关系问题,刘春勇认为,鲁迅的《野草》写作以及1926、1927年的《写在〈坟〉后面》和《铸剑》,其实是甩掉这些毒气和鬼气的过程,到了1930年后,鲁迅的文字和生命中呈现出某种澄明的世界。对于张永辉提出的如何寻找鲁迅关键词这个问题,刘春勇认为虚妄它不是高频词,但它暗含着鲁迅精神层面的、本身的东西,关键词与其在作品中出现频率无直接关系。对于孙良好的形上与形下问题,刘春勇说,《文章在兹》当中的“虚妄”和“留白”对他而言并不止是形上的语词,而是自己生命的信仰和实践。

四、钱理群先生的长篇寄语

在研讨过程中,钱理群先生多次做了临场感言,除了上述的对话剧《大先生》和对《文章在兹》的意见外,钱先生还详尽地讲述了自己对青年鲁迅研究的期望,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表达了自己的忧虑,钱先生寄语在座的青年学者说,“第一要凭兴趣做学问,第二要凭良知教书”。对于鲁迅及鲁迅研究的意义,钱先生认为,鲁迅不是被抬高过度了,而是还认识得不够。钱先生认为鲁迅真正的知音必定在中国当代青年中产生,他希望“70后”研究者学习鲁迅精神,守住底线,如果无法不做奴隶,那么应该拒绝做奴才。他认为,理解鲁迅区分奴隶、奴才的思想,对于我们当下如何做人,如何活着有很大的意义。学者既要坚守学术,也要关心现实,而且还必须具有现实超越性,思考一些人类精神根本性的问题以及人类文明之根的问题,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价值、新的理想,这才是知识分子的本职。在钱先生看来,鲁迅的价值在于他既是原创性的作家同时也是源泉性的作家,这两点决定鲁迅在中国现代的无与伦比的价值。但他认为令人遗憾的是,至今鲁迅研究都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究其原因是,研究者的视野没有打开,始终在既定的框架中延续以往的研究,将来要取得突破,我们必须“打破以往的观念,重新检讨人类文明,在一个大的背景下来考虑这个问题”。钱先生认为,鲁迅研究两个最重要的方面,一个是鲁迅本体的问题,这个当然很重要,但第二个问题却常常被人忽略,就是“接着鲁迅往下走”的问题。钱先生透露说,他现在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接着鲁迅往下走”。最后,钱先生希望广大研究者关注未来研究中的三个重要问题,即人和自然的关系、对人类文明的全面检讨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的问题。

此次论坛是中国鲁研界“70后”群体在京以“沙龙”形式首次召开的研讨会,从会议的过程与效果来看,研讨会取得了圆满成功。

[责任编辑:周南 jidazhounan@163.com]